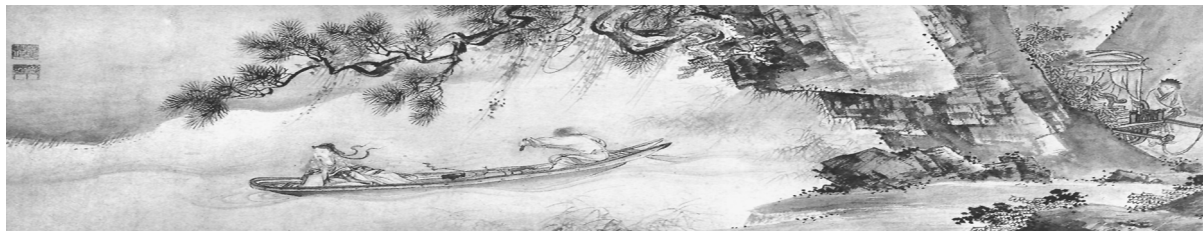


# 宋词说宋史

诸葛忆兵 著

中华书局



# 目录

( )…… 前 言

( )…… 浊酒一杯家万里,燕然未勒归无计  
——北宋与西夏的战争

( )…… 针线闲拈伴伊坐。和我。免使年少,光阴虚过  
——宋代的歌楼妓院

( )…… 市列珠玑,户盈罗绮,竞豪奢  
——宋代的都市经济

( )…… 黄金榜上,偶失龙头望  
——宋代的科举考试

( )…… 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  
——宋代官制与官员的平庸



## 目录

( ) ····· 文章太守,挥毫万字,一饮千钟

——宋人的基本国策:重文轻武

( ) ····· 梦魂惯得无拘检,又踏杨花过谢桥

——宋人的恋情相思与身世感伤

( ) ····· 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

——宋代知识分子的精神风貌

( ) ····· 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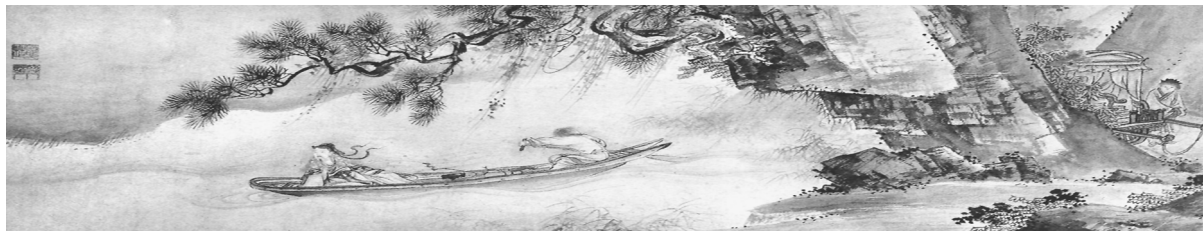
——新旧党争与“乌台诗案”

( ) ····· 平生个里愿杯深,去国十年老尽、少年心

——徽宗年间党争与“元祐党人”碑

( ) ····· 马滑霜浓,不如休去,直是少人行

——徽宗放纵享受和北宋末年社会风气



## 目录

( ) ····· 花自飘零水自流，一种相思，两处闲愁

——李清照的婚姻与宋代妇女生活

( ) ····· 坐看骄兵南渡，沸浪骇奔鲸

——金人入侵与“靖康之变”

( ) ····· 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

——“岳家军”抗金和岳飞冤案

( ) ····· 闻道中原遗老，常南望、羽葆霓旌

——南宋数度北伐和宋金对峙局面

( ) ····· 那堪独坐青灯。想故国、高台明月

——元人入主中原和南宋覆亡

## 前 言

文史不分家，文学创作是现实社会的形象表现。通过阅读某个时代的文学作品，能够从一个角度了解那个时代的诸多历史现象。这些基本道理，人人皆知。然而，在中国古代，不同体裁的文学作品，反映社会生活的宽窄面是完全不一样的。例如，拿诗与词做一个比较。在古人创作观念中，“诗言志”，诗歌可以反映广阔的社会现实内容；“词言情”，词只能用来抒写狭窄的男女感情。所以，从风格的角度也形成了“诗庄词媚”的说法。

词起源于燕乐，最初是配合燕乐歌唱的歌词。“燕乐”的“燕”字通“宴”，“燕乐”就是举行宴席时演奏或演唱的音乐。换句话说，大量的西域音乐传入中原，最终形成“燕乐”体系，其间是经过中原音乐家、文人特意选择的。隋唐之际，人们在歌舞酒宴娱乐之时，厌倦了旧的音乐，对新传入中原的新鲜活泼的外来音乐发生浓厚兴趣，于是纷纷带着一种娱情、享乐的心理期待转向这些新的音乐，听“十七八女孩儿，执红牙板”，曼声细唱，莺娇燕柔。那么，在这些灯红酒绿、歌舞寻欢的娱乐场所，让歌妓舞女们演唱一些什么样内容的歌曲呢？是否可以让这些歌儿舞女板着脸孔唱道：“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或者让她们扯开喉咙唱道：“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这一切显然都是与眼前寻欢作乐的歌舞场面不协调的，是大煞风景的。于是，歌唱一些男女相恋相思的“艳词”，歌妓们装出娇媚慵懶的情态，那是最吻合眼前情景的。“艳词”的内容

取向是由其流传的场所和所发挥的娱乐功能决定的。

“词为艳科”，宋词以善写男女私情著称。宋词描写最多的就是男欢女爱、春恨秋愁、离思别绪、风花雪月等题材内容，与“艳情”有着直接或间接的关系。宋人牢固树立起了“词言情”、“诗言志”的传统，二者泾渭分明，各司其职。柳永写诗，就会去反映海滨盐民生活的艰辛劳苦，其诗作《盐民叹》的作风与白居易“惟歌生民病”的新乐府诗相似；柳永的词则几乎都在津津乐道地夸耀自己“偎红依翠，风流事、平生畅”（《鹤冲天》）的艳冶生活经历，以及由此带来的别离苦思。李清照《乌江》诗说：“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铿锵有力，掷地有声；李清照的词则几乎是清一色的“莫道不消魂，帘卷西风，人比黄花瘦”（《醉花阴》）一类缠绵悱恻的吟唱。委婉言情已经成为宋词的固定文体特征。宋词能够继唐诗而起，开辟出一片全新的创作天地，给后代读者以无穷的审美享受，就是因为具备了与众不同的这一文体特征。宋词的审美价值和认识价值奠基于此，宋词的巨大艺术魅力也来源于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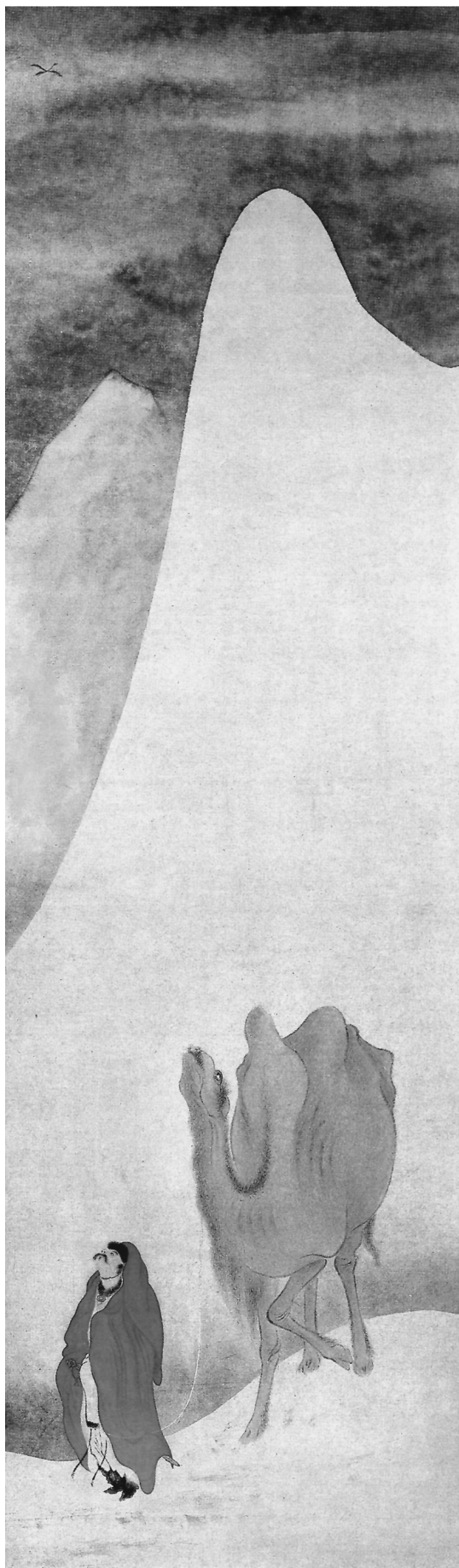
宋词发展到苏轼时代，上述创作局面才发生了相当的变化。苏轼变革歌词创作，“以诗为词”。苏轼词扩大了反映生活的领域，做到“无意不可入，无事不可言也”（刘熙载《艺概·词曲概》）。在苏轼现存的三百余首词里，诸如咏史、游仙、悼亡、惜别、登临、宴赏等题材，无所不包。此外，山河风貌，田园风光，参禅悟道，哲理探讨等，也都一一纳入笔下。经过苏轼的创作，人们才真正看到词可以反映广阔的生活内容。苏轼的做法，在北宋响应者寥寥无几。金兵入侵，北宋覆亡。南宋小朝廷始终笼罩在外族入侵的阴影之下。南宋所有的文学体裁，无不受这历史巨变的影响。遍览南宋词坛，词亦不得不走出象牙之塔，把目光投

向更广阔的社会现实,苏轼的豪放词在此时发挥了广泛的影响。南宋词创作的新倾向,逐渐汇集成巨大的创作流派,这就是以辛弃疾为代表的爱国词派。辛弃疾词数量众多,涉及面广泛。辛弃疾一生都是矢志不移的抗金战士,北伐大业始终是他关注的焦点,因此创作了大量的爱国词。

“词为艳科”的传统是强大的。宋词虽然经过苏轼、辛弃疾等人的变革,反映社会的生活面大大拓展,但是,抒写男女情爱始终是宋词的创作主流。即使是苏轼本人,流传至今的三百五十余首歌词中,约三百一十余首作品仍然与“艳情”相关。从这个角度观察宋词,宋词与宋史的联系就过于偏狭。所以,阅读宋词,很难比较全面地了解宋代的历史。这是阅读本书时,应该提醒读者朋友们注意的问题。当然,笔者仍然期待一种新的阅读视野,能够给读者朋友带来新的阅读体验,从而对宋词与宋史都能加深印象,加深理解。

# 浊酒一杯家万里，燕然未勒归无计

——北宋与西夏的战争



塞下秋来风景异，衡阳雁去无留意。四面边声连角起。  
千嶂里，长烟落日孤城闭。    浊酒一杯家万里，燕然未勒  
归无计。羌管悠悠霜满地。人不寐，将军白发征夫泪。

——范仲淹《渔家傲》

这首词作于北宋与西夏战争对峙时期。宋仁宗年间，范仲淹被朝廷派往西北前线，承担起北宋西北边疆防卫重任。词是范仲淹守边愿望和复杂心态的真实袒露。词中反映了边塞生活的艰苦和词人巩固边防的决心和意愿，同时还表现出外患未除、功业未建、久戍边地、士兵思乡等复杂矛盾的心情。在有着浓郁思乡情绪的将士们的眼中，塞外之景色失去了宽广的气魄、欢愉的气氛，画面上笼罩着一种旷远雄浑、苍凉悲壮的气氛。在边塞熬白黑发，滴尽思乡泪，却又不能抛开国事不顾，将士们的心理是矛盾复杂的。范仲淹虽然守边颇见成效，然而，当时在北宋与西夏的军事力量对比上，北宋处于下风，只能保持守势。范仲淹守边的全部功绩都体现在“能够维持住守势”这样一个局面上，时而且还有疲于奔命之感。这对有远大政治志向的范仲淹来说肯定是不能满足的，但又是十分无奈的。所以，体现在词中的格调就不会是昂扬慷慨的。此前，很少有人用词来写边塞生活。唐代韦应物的《调笑》虽有“边草无穷日暮”之句，但没有展开，且缺少真实的生活基础。所以，这首词实际上是边塞词的首创。

## 西夏的崛起

夏国崛起于宋朝的西北边境，史称“西夏”。这是由党项拓拔部在北宋时期建立的国家。党项族自唐朝以来，一直散居于今天的宁夏、甘肃、青海等地区，而以居住在夏州（今陕西靖边北白城子）的一个党项部落尤为强大，称平夏部。其首领拓拔思恭率部参加平定黄巢起义的战争，因功被唐朝授予夏州节度使，赐姓李，封夏国公，统辖夏、绥、银、宥四州（相当于今陕西北部与内蒙伊克昭盟南部）。从唐末到北宋初年，拓拔氏世代相传，一直是该行政辖区的统治者。北宋太祖、太宗时期，拓拔族与中原政权时而战争，时而结盟，对宋朝没有构成太大的威胁。宋太宗太平兴国七年（982），夏州节度使李继捧因继位的合法性问题遭受宗室其他成员质疑，无法在当地立足，遂将所辖四州献给宋朝，率部

分族人入朝并留居京师。宋太宗乘机派遣官员直接管理夏州，削弱当地党项势力，夺取拓拔贵族的兵权，强迫党项族人内迁。宋廷的这些措施引起当地拓拔贵族和党项百姓的不满，李继捧的族弟李继迁等率众逃往夏州东北三百里地斤泽，打出复兴宗族部落的旗号，获得相当部落的支持，势力逐渐扩张。以后二十余年，与宋朝之间经过了一系列的战争，慢慢站稳脚跟。

宋真宗咸平五年(1002)，李继迁攻陷灵州(今宁夏灵武西南)，改灵州为西平府，以此作为夏国都城。李继迁最终在一次战争败退时身中流矢，伤重不治去世，其子李德明继位。李继迁临终时已经清楚地意识到，战争同样给党项民族带来了深重的灾难，嘱咐李德明与宋廷议和。因此，李德明继位后，即上表归顺宋朝。宋廷也急于从西北边疆的战争中摆脱出来，欣然接受李德明的归顺。宋真宗景德二年(1005)，宋、夏订立和约，宋朝承认李德明占有银、夏、灵诸州的既成事实，封其为西平王，授其为定难军节度使。而且，每年赐给银一万两、绢一万匹、钱三万贯、茶二万斤。李德明同时接受辽国的册封，为大夏国王，在宋辽之间寻求生存发展的空间。西夏在与宋朝议和的前提下，悄悄兼并土地，扩张势力。

宋仁宗明道元年(1032)，李德明去世，元昊继承西夏国王位。李继迁、李德明两代东征西讨，其目的是为了自立。在自立的前提下，他们仍然愿意臣属于宋廷。元昊则有更多的雄心大略，他不愿意继续臣属宋廷，追求与宋朝分庭抗礼的对等国家地位。继位之后，开始有步骤地实施其立国称帝的宏伟计划。在这个过程中，元昊特意突出党项民族意识，增强民族凝聚力，以为立国之本。除了模仿中原王朝政治体制、逐步完善国家机器之外，元昊亲自主持了党项族的文字创制工作，创西夏民族文字“蕃书”，后人称其为“西夏文”。经过数年的周密准备，宝元元年(1038)十月十一日，元昊正式立国称帝，国号大夏，自称“始文英武兴法建礼仁孝皇帝”。在这期间，西夏国力迅速强大，开始了一系列扩张领土、张扬国势的对外战争，西夏与北宋之间大规模的战争因此爆发。

再看北宋方面，自其立国之初，有鉴于唐代藩镇割据、军人跋扈的

史实,多年来贯彻实施强干弱枝、守内虚外和重文轻武的一系列基本国策,使得北宋中央集权统治得到了有效的强化。但是,这一系列基本国策的实施也造成了北宋军事力量的薄弱和边塞防卫的松弛。以北宋与西夏的接壤边境为例,宋朝军队的军事训练荒废已久,将军与士兵安享朝廷的奉养,“饱于衣食”,却连基本的军事素养都不具备。有的将士甚至不能披戴盔甲、上马奔驰。那些还能够骑上战马、拉开弓弦、做出射箭动作的,也只能望空发箭,射出一二十步的距离。而且,边塞“城池不修,资粮无备”(详见《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28、132)。面对精心准备、来势凶猛的西夏军队,两军的优劣、战争的胜负,都是一目了然、可以预见的。

北宋朝廷却并没有真正意识到双方军事力量对比等一系列问题。一方面,真宗以来,对西夏的扩张一直采取姑息妥协的政策,美其名曰:“姑务羁縻,以缓征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63)即姑且同意西夏表面称臣的做法,以求避免战争。直到元昊南面称帝,宋廷一开始依然不知所措。另一方面,面对西夏,宋廷仍然有中央大国心态。认为党项小族,实力有限,不可能真正与中央朝廷对抗。所以,宋廷也就不能接受西夏的“独立”,强硬的态度渐渐为朝野所认可。元昊称帝的第二个月,宋廷就诏令沿边禁绝与西夏互市,第二年二月又废除了保安军榷场。这一年的六月,宋仁宗下诏削夺元昊的一切官爵,撤销所赐国姓,并且对西夏实施经济制裁。朝廷明诏边疆有能捕捉元昊派遣的刺探者,赏钱十万。同时,宋廷也加紧边塞的军事部署,以求用战争手段解决问题。宝元元年(1038)十二月,朝廷调任环庆路副部署、殿前都虞候、邕州观察使刘平为鄜延路副部署,三司使、户部尚书夏竦为奉宁节度使、知永兴军,资政殿学士、吏部侍郎、知河南府范雍为振武节度使、知延州。由夏竦和范雍主持陕西方面的军事防卫事宜。朝廷又颁布命令,让陕西军队中了解西夏国情的“勇敢智谋之士”,赴京师向朝廷陈述攻取战略方针。招募全国各地的精兵分隶禁军,以图增强西北防线的军事力量。宋、夏双方秣马厉兵,战争一触即发。

## 三川口之战

宋仁宗景祐元年(1034)以来,元昊一直在宋、夏边境发动小规模尝试性军事进攻,以了解北宋的军事部署和军队实力,寻求大规模军事活动的战机。宋仁宗康定元年(1040)正月,元昊经过精心的策划和准备,终于发起了对鄜延路帅府地延州方面大规模的军事进攻。

知延州范雍并无军事韬略,得知元昊军事行动的消息后,赶紧上报朝廷,请求增兵援助。同时,元昊派部属向范雍诈降,传递虚假军事情报,范雍居然深信不疑,延州方面遂不再做军事防备。元昊于是率大军发起突然进攻,首先攻占延州西北面的金明寨,活捉素有“铁壁相公”之称的李士彬父子。而后,连续攻破安远、塞门、永平诸寨,西夏大军抵至延州城下。范雍紧闭城门,坚守延州,且急调刘平、石元孙、黄德和三将领率部众万余人增援延州。刘平轻敌冒进,被夏人引入延州附近的三川口(今延安市西北)预设埋伏区,陷入西夏军队的重重包围之中。宋军力战无法突围,黄德和率后军首先溃逃,宋军全线崩溃,刘平和石元孙都被俘获。这一战,震动北宋朝野,史称“三川口之战”。西夏军队围困延州七日七夜,因大雪而撤军,延州得以幸存。

三川口战役后,宋廷对中央政府和西北边防都做了重新调整和部署。中书和枢密院二府应对战败负最终领导责任,最高长官被集体罢免。西北主帅范雍被降职,另调韩琦等人主持前线防务。韩琦上任后,立即向朝廷推荐大自己十九岁的范仲淹。康定元年(1040)三月,知越州范仲淹被调往西北前线,与韩琦共同承担起军事防护的重责。这一年的五月,宋廷任命夏竦为陕西都部署兼经略安抚使、缘边招讨使,作为西北前线的主帅;任命韩琦和范仲淹为陕西经略安抚副使、同管勾都部署司事,作为夏竦的副手。韩琦负责泾源路防务(治所在渭州,即今甘肃平凉),范仲淹负责鄜延路防务(治所在延州,即今延安),夏竦驻扎在永兴军(今西安市)。三人互为犄角,组成西北前沿新的

防线。

## 宋朝方面的战守之争

范仲淹临危授命，到达延州后，发现当地“戎马之后，原野萧条”，处处破败凄凉。此时，知延州张存不堪重任，以母老为理由，请求调回内地。范仲淹在国家危难之际，显示出他以天下为己任的博大心胸，主动要求兼知延州，朝廷欣然同意。

北宋派文臣作为军队的统帅，文臣多数不通军务，这就成为北宋军队屡战屡败的原因之一。北宋文臣中也有个别才干过人、兼通军事的杰出人才，范仲淹就是一个典型。

范仲淹对宋、夏双方的形势有非常切合实际的深入透彻的了解，做到了知己知彼。面对北宋社会“积贫积弱”和军队士气低落的现实局面，范仲淹提出了积极防御的应对策略。他反对宋廷妄自尊大，盲目地对西夏发动反攻。宋朝军队在数量上虽然要大大超过西夏军队，但是，缺乏“宿将精兵”，缺乏训练，军心涣散，战斗实力反而远远不如对方。而且，宋朝军队如果想讨伐西夏，还要长距离地穿越沙漠等荒凉地带，粮草军需供应都非常困难。有鉴于此，范仲淹反对深入西夏境内的攻击战，主张训练边塞军队，打一场持久的防御战。

针对沿边军队编制和作战方式不合理、缺乏起码的军事训练等现状，范仲淹着手大规模的整顿和变革。宋朝军队官制有总管、钤辖、都监等级别，总管领兵一万人，钤辖领兵五千人，都监领兵三千人。一旦发生战争，官小的先领兵出战。范仲淹说：“将不择人，以官为先后，取败之道也。”（《宋史·范仲淹传》）如果打仗不根据具体需要选择将领，而只是以官阶的高低作为依据，当然是很荒谬的。范仲淹全面检阅延州军队，淘汰老弱军人，选取了一万八千名精兵，分作六队，分派六位都监统率。对这些选择出来的精兵，又进行了严格的军事训练。如果有敌军入侵，就根据敌情的不同，各队轮番出战，相互照应。经过范仲淹

的整顿训练,军队面貌一新,应变能力和作战能力大大提高。范仲淹这些做法,很快就在西北前线其他军事防区得以推广。

范仲淹贯彻积极的防御战略,派遣经过整顿训练的军队,在延州周边主动出战。延州军队一方面修复金明寨、万安城,一方面收复了塞门寨等军事据点,延州的外围军事防线整体上得到加强。范仲淹又听取部将种世衡的建议,派遣种世衡率兵在离延州二百里的故垒上修筑城池,取名为“青涧城”,成为延州的有力屏障。范仲淹再派任福率兵深入西夏境内四十余里地,攻破西夏城池,俘获甚多。变被动挨打为主动出击,变屡战屡败为初战告捷,延州前线的紧张危险形势得到了充分的缓解。据说西夏人都有这样的说法:“无以延州为意,今小范老子腹中自有数万兵甲,不比大范老子可欺也。”(《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28)就是说,再也不能打延州的主意了,范仲淹胸中就有数万大军。大范,指范雍;小范,指范仲淹。可见西夏人对范仲淹的敬畏之心。

韩琦的战略思想,却与范仲淹不同,他主张积极进攻,寻找西夏主力决战,速战速决,彻底歼灭西夏主要军事力量。随着西北军事力量的加强,宋仁宗求胜之心变得日益迫切。他召集两府大臣集体商议西北军务,宰相吕夷简等都主张进攻,认为长期防御耗费太大。于是,朝廷决定采用韩琦、尹洙所上的攻策,诏令鄜延、泾源两路共同发兵,全国其他地方调发五万头驴为陕西前线运送军需给养。发动进攻的时间定在宋仁宗庆历元年(1041)春天。

作为鄜延路主帅,范仲淹向朝廷连上三表,坚决反对进攻决策。范仲淹认为初春塞外雨雪酷寒,宋军深入险阻之地,行动不便,战争没有胜算。如果遭受西夏军突袭,两路大军溃败,西北边防就完全空虚了。但他的意见并没有被求胜心切的宋仁宗采纳,范仲淹只好要求鄜延路按兵不动,一方面用来牵制西夏东面的军力,一方面也为两国和谈留出一条退路。宋朝军队对外战争失败的教训太多了,宋太宗以后的历代皇帝从内心深处对战争都有一种恐惧感,没有取胜的信心,宋仁宗也不例外。所以,范仲淹留有后路的请求也得到了朝廷的批准。

韩琦和尹洙,从私交角度来说,是范仲淹的知己朋友;从政见角度来说,是范仲淹坚定的政治盟友。他们依然希望范仲淹共同出兵,以增强宋军的进攻实力。主帅夏竦特派尹洙到延州,当面说服范仲淹。尹洙在延州逗留二十天,最终也不能劝说范仲淹出兵,叹息认为,范仲淹这点不如韩琦,韩琦能够将胜负置之度外,果断决策,范仲淹则过于谨慎。范仲淹回答说:“大军出动,关系到千百万人的性命,怎么可以将胜负置之度外?”

## 好水川之战

庆历元年(1041)二月,元昊率十万大军进攻渭州,逼近怀远城(今宁夏吉县偏城乡)。韩琦认为决战的时间到了,立即赶往前线作军事部署。韩琦命令环庆副总管任福率一万八千士兵绕道敌后,截断西夏军归路,等西夏军队回头时再予以截击。之前,不可轻易与敌军交战。韩琦甚至叮嘱说:“如果违背命令,有功劳也要斩首。”

任福率兵在张家堡(今宁夏隆德境内)南遭遇敌军,短兵相接,斩首数百,西夏军队丢弃装备、财物,仓惶逃窜。其实,这是元昊设定的诱敌深入的计谋,前方已经设好埋伏圈,等待宋军自投罗网。任福果然贪功轻敌,完全不顾韩琦的战略部署,也完全忘记了韩琦的一再叮嘱,率部急追。宋军因此脱离了原来的行军路线,粮草不继,将士疲乏,到达好水川(今宁夏隆德城北)时,钻进了西夏军队设置的包围圈。元昊事先在路边放置了一些银白色的泥盒子,进入包围圈的宋军打开盒子,一百多只哨鸽腾空飞起,埋伏在四周山峦之间的西夏十万大军见哨鸽一起涌出,将宋军分割成三部分,团团围住。好水川一战,宋军阵亡万余人,主将任福战死疆场。西夏军队乘势大肆抢掠北宋沿边州县,西北边防再度全面吃紧。西夏人因此嘲笑宋朝将帅和士兵的无能,说:“夏竦何时耸,韩琦未是奇。满川龙虎犇,犹自说兵机。”

任福违背命令、轻敌冒进,要对这次战败负直接责任。韩琦作为主

帅，用人不当，贸然出兵，更应该负主要责任。韩琦回军路上，遇到阵亡将士的家属数千人，捧着死者旧衣、提着纸钱，拦路哭泣招魂，他们哭道：“你们过去随韩招讨使出征，今天诏讨使回来而你们却战死了，你们的灵魂不知能跟随诏讨使回来吗？”哭声震天动地，韩琦内疚悲泣，驻马不前。范仲淹听说此事后，叹息说：“此时此刻，就不能将胜负置之度外了。”这一战，史称“好水川之战”。

好水川之战的结果证明了范仲淹有关西北军事决策的正确性。范仲淹始终坚持与西夏交往必须采取军事、外交并重的方针，军事上采取积极防御的策略，外交上寻求两国和解的途径。在好水川之战前，元昊就曾派被俘的塞门寨寨主高延德到延州向范仲淹请和。此时，元昊正在积极准备发动新一轮战争，请和显然仅仅是一种掩饰真实目的的手段。范仲淹思维敏锐缜密，看穿了元昊所玩的诡计，认为这次请和没有诚意，西夏也没有提供请和的正式表章，所以决定不向朝廷报告。自己起草，给元昊回复一信，晓之以大义，劝说元昊与宋朝议和。好水川之战后，元昊态度转而强横，回信中语气傲慢，且有许多不恭的言语。范仲淹从顾全大国体面和皇帝尊严的角度出发，录下副本后，当着使者面焚烧来信，仅将信末求和的一些言辞，上报朝廷。范仲淹勇于承担责任的做法，违背了封建专制时代“人臣无外交”的原则，在朝廷内引发了相当大的争议，副宰相宋庠甚至请求将范仲淹斩首。军政副长官杜衍则认为，范仲淹忠心耿耿，本意是为朝廷分忧，不可以过重责罚。宰相吕夷简和宋仁宗都同意这样的处理意见。范仲淹被降职，改知耀州（今陕西耀州）。韩琦也因败战自请处分，降职改知秦州（今甘肃天水）。

### 定川砦之战与庆历和议

韩琦、范仲淹虽然遭降职处分，但这仅仅是朝廷姿态性的一种做法，朝廷依然将西北前线的军务托付给韩琦、范仲淹。同年十月，朝廷重新起用二人。朝廷将西北防线重新划分为秦凤、泾源、环庆、鄜延四